

高职外语教育政策演进及发展规划研究

陈玲敏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语言教育规划对语言教育的有效实现至关重要。在厘清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概念的基础上, 阐述库珀的“八问方案”, 运用该理论进一步分析高职外语教育政策的演进以及各阶段的主要特征, 并提出以《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年版)》的颁布为契机, 科学规划高职外语教育的建议。

关键词: 外语教育; 高职; 政策演进; 教育规划

中图分类号: G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415[2023]-05-0039-05

语言教育规划对语言教育的有效实现至关重要。外语是提高国际竞争力、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工具。在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当下, 加强对外语教育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研究从2000年起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外国语大学或综合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专业学生的外语教育, 针对高职院校学生外语教育的规划和政策研究微乎其微。然而, 职业院校毕业生在服务国家战略发展中的作用已不容小觑。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介绍, “十三五”期间, 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一线新增人员有70%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同时, 职业教育也处在巨大的变革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 中国优质企业积极走出去, 在贸易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物流运输、清洁能源、农业贸易等领域的国际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这也必然推动国内优秀技能人才走向国际人才市场, 在全球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语言作为人类交际和思维最为重要的符号系统以及文化最重要的承载者、阐释者和建构者^[1], 必然在企业国际化发展及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中起

到重要作用。因此, 为高职学生外语能力提升而制定的外语教育规划必须引起充分重视。

一、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理论阐述

(一)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概念界定

通常情况下, 语言政策是指由政府或其他政治组织制定有关语言使用的法律、法规和官方立场, 以及分配语言资源的行为。语言规划是指政府或社会团体对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进行的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人工干预与管理, 主要包括语言地位规划、语言本体规划等。虽然学界存在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有区别的观点, 如语言规划的实施会导致或指导政府(或其他权威机构或个人)颁布语言政策^[2]。语言规划是改变言语社团语言行为的所作所为, 而语言政策是具体语言规划过程背后更宽泛的语言目标、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3], 但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这两个词经常交替使用, 几乎没有在概念上对两者进行区分, 本文在阐述过程中也采用一种较为模糊的概念。

(二) 库珀(Cooper)“八问方案”

继1959年挪威籍美国语言学家Haugen首次提出“语言规划”这一术语和1969年Kloss提出语言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理论后, Cooper于1989年在传统的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分类基础上扩展

收稿日期: 2023-05-15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9年度职业院校外语教育教学研究课题“语言教育规划视角下的高职院校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编号: FLEB045; 主持人: 陈玲敏)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玲敏(1980—), 女, 山东泰安人,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国际商学院, 副教授, 硕士。

出来的一个新的分类,取名“语言习得规划”或“语言教育规划”。此后,语言教育规划理论不断发展完善(Fettes, 2003; Kaplan & Baldauf, 2003; 2005, etc),但理论框架主要是基于Cooper(1989)在其著作《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来的“八问方案”(Accounting Scheme)。Cooper认为可以从八个方面去分析语言规划活动:谁是规划的制订者?针对什么行为?针对哪些人?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出于什么动机)?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决策过程?效果如何^[4]?此后,Spolsky和Shohamy曾尝试针对社会语言学与语言规划、政治学和政策研究、教育与教育语言学等三个学科对“八问方案”进行诠释,试图为“八问”中除目的和手段外的六问提供答案。他们认为在教育与教育语言学领域,政策规划者包括教育政策制定者、中央和地方的教育领导者,政策规划行为和过程是选择要教的语言以及决定教育资源的使用,目标群体为教师和学生,规划目的是实施语言教育,规划条件是在教育系统中进行,其结果是影响考试结果、学业水平等^[5]。

二、高职外语教育的政策演进历程及主要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台了三个面向高职(专科)英语教学的指导性文件,基本概括了高职外语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初步形成、传承发展和深入发展。高职外语教育从最初依附于本科外语教学的状态中脱离出来,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向纵深发展。

(一) 初步形成阶段(1993—2000年)

1993年7月,原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专科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是国家教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高等专科公共外语教学方面制订的第一个指导性教学文件。它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专科英语教学开始进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6]。1997年,普通高等专科英语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旨在贯彻文件要求,深化教学改革。在此阶段,以“实用为主,以应用为目的”成为英语教学的主旋律。配套系列教材《实用英语》相继出版并得到广泛应用,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国家级题库也研发成功,并于2000年正式推出基于题库的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对学生使用英语进

行涉外交际的能力进行测评。值得注意的是,本阶段英语教学将阅读和翻译两种书面交际能力的培养作为英语教学重点,认为专科英语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掌握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基础上,具备阅读和翻译与专业相关的英语资料的初步能力,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应用能力打下一定的基础。

(二) 传承发展阶段(2000—2021年)

20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三教统筹”“三改一补”的改革思路和原则,以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1999年,第一次全国高职高专教学工作会议确定了之后高职高专教育教学改革和建设工作的思路和主要任务,启动教学改革和建设项目的思路^[7]。为适应高职教育的发展要求,2001年,教育部成立了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和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委员会。2000年,教学指导委员会在传承的基础上研制出《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以下简称“基本要求”),除了延续原有标准“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理念,“基本要求”还从原来的阅读和翻译能力为主转向听说领先,使学习者在涉外交际的日常活动和业务活动中进行简单的口头和书面交流,并为后续进一步提高英语的交际能力打下基础。同时,“基本要求”提出对学生进行分类指导,根据学生入学英语水平的差异,将教学和测试分A、B两级^[8]。“基本要求”,《新编实用英语》等适用于高职高专英语教学的教材相继出版,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A级、B级)笔试顺利开展,一直持续到今天。为探索听说能力培养的有效路径,2005年开始开展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口试,高教社杯“全国高职高专实用英语口语大赛”也应运而生,进一步推动了高职院校英语教学改革。

(三) 深入发展阶段(2021年—)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将立德树人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明确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强调两种教育类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充分学习党中央相

关文件的基础上,《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2021年版)》)研制小组认真研读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程标准》《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等相关课程标准,准确理解了英语课程核心素养的概念,提出了高职英语课程教学的4个核心素养,包括职场涉外沟通、多元文化交流、语言思维提升和自主学习完善,并分别详细描述了四项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目标,旨在促进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能够在日常生活和职场中用英语进行有效沟通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9]。围绕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2021版高职英语课程指南对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学业质量、课程实施等进行了详尽地描述,为高职英语课程进行课程建设、开展课程评价、推动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三个指导性文件的立足点都在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应高职专科学生的外语能力特点。文件内容从最初对英语教学要求的

抽象描述逐步发展为对英语课程标准的具体指导,考虑更全面、要求更明确。同时,教学要求和课程标准的出台改善了高职外语教育环境,打造了许多优质外语教育资源,产出了许多优秀科研成果,进一步促进了高职外语教育的繁荣发展。

三、“八问方案”视角下高职外语政策发展

结合“八问方案”,将高职外语教育政策各阶段发展中的要素分析,如表1所示。

从表格1分析可以看出,三个指导性文件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从宏观层面对高职外语教育进行规划和研究,体现宏观政策主体的外语教育理念。普拉特认为,关于语言教学的语言政策制定不仅包括国家层面的决策(如教何种语言,对谁教),也包括较低层面的补充决定,而且后者的决定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前者的决定;马基也曾指出,教师对教材选择所做的决定和教育部对英语教学周时数的决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4]。由此可见,作为教育政策的关键决策主体,高职院校管理人员和一线教师的主观能动作用应得到充分发挥,其补充决定能确保宏观政策在高职院校实施过程中达到预期目标。

表1 高职外语教学政策各阶段要素

变量	初步形成阶段	传承发展阶段	深入发展阶段
规划的决策者	国家教委	教育部	教育部
针对什么行为	高等专科学校公共外语教学行为	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行为	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教学行为
针对哪些人	高等专科学校英语教师和学生	高职高专院校英语教师和学生	高等职业教育中的英语教师和专科学生
达到什么目的 (出于什么动机)	提高高等专科学校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满足专科生个人发展的需求	提高高职高专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满足高职高专学生个人发展的需求	培养学生学习英语和应用英语的能力,为学生未来继续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英语基础
在什么条件下	专科英语教学依附于本科教学大纲,未能体现专科英语课程的特色,也未能反映社会对专科人才外语能力的需求	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高职高专教育;高职高专教育要与职业就业标准相兼容,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提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
用什么方式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颁布指导性政策文件、宣传、研讨、开展教学改革等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颁布指导性政策文件、宣传、研讨、开展教学改革等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颁布指导性政策文件、宣传、研讨、开展教学改革等
通过什么决策过程	发现问题——明确目标——探索方法——出台政策	发现问题——明确目标——探索方法——出台政策	发现问题——明确目标——探索方法——出台政策
效果如何	逐步建立起具有专科特色的外语教育理念;教材、题库等教学资源也相继问世,推动了专科英语教学的发展	逐步建立起具有高职高专特色、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外语教育体系,职业外语能力培养成效显著	政策出台后,一般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跨度才能见效,因此本标准的实际效果有待评估

四、以《课程标准》(2021年版)为契机科学规划高职外语教育

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应当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坚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原则。在教育部发布《课程标准》(2021年版)的新形势下,作为学校域外语教育政策的决策者,高职院校应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针对本校普通专科学生的外语习得行为制定恰当的规划方案,以提高学生的外语语言应用能力,满足其个人职场发展的需求。

(一) 以宏观语言政策为指导加强微观语言规划

Kaplan & Baldauf 认为,语言规划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宏观语言规划是指宏观层面、大范围的国家规划,通常由政府执行,旨在影响整个社会的话语方式和文化实践活动^[10];中观语言规划的范围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指社会各领域的语言规划或各地域的语言生活^[11],本文不做详述。微观语言规划是指从微观视角对学校、家庭、社区等领域进行语言规划。宏观语言政策和规划提供方向性,微观语言政策和规划提供某一具体领域的操作和实施指导^{[12][13]}。由此可见,宏观语言规划制定的纲领性文件需要微观语言政策参与者的积极配合才能落到实处。对于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教学来说,三个不同时期《课程标准》的制定和颁布属于宏观语言规划,是从国家层面由政府部门主导的意在影响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教育的话语和实践活动。学校域的参与者(如校领导、教务处、教师等)作为微观语言规划的重要决策者,需在各自的层面做好规划引导,如学校领导层和教务处应在排除外界杂音的基础上,通过充分的调研,制定适合本校校情的语言教育规划政策,以指导本校教师的语言教育活动;语言教师应在语言教育政策的师资、课程、教材教法、资源、社区、评估等维度深入研究和实践,切实提高本校学生外语技能的适应性,满足学生职场发展的需要。

(二) 结合地方经济和院校发展特色丰富外语语种设置

传统意义上讲,语言规划可分为语言本体规划和语言地位规划。本体规划是对语言本身的规

划,主要范畴有文字化、规范化、现代化、编典化和精致化等,本文不做讨论。地位规划是国家政府对本国各种语言的重要性或者地位的认可。后来,地位规划的用途扩大到本国各语言及其变体的特定功能,如教学媒介语、官方语言和大众传媒语等。戈尔曼^[14]把语言的功能定义为“权威机构对特定情境下语言使用范围或语言功能范围的维持、扩大或限制所作出的决定。”对高职外语教育进行地位规划,即重新审视高职教育中各种外语的重要性,并由此进一步制定语言教育规划方案。通过对全国56所“双高计划”建设院校进行简单统计得出:英语在高职院校外语教育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所有的“双高计划”建设院校都开设有英语课程,且《大学英语》课程覆盖所有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英语的优势地位与英语的全球霸权及我国英语教育政策的历史沿革有着必然的联系。但也不难看出,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开始探索适应地方需求的外语教育政策与模式,如针对大批德资企业在无锡投资建厂带来的就业环境变化,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商务德语专业,为企业量身定制适应岗位需求的德语人才培养方案;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为适应学生就业发展的需要,推出了“专业+语言+国别”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引入日语、法语等外语课程丰富外语语种,结合学校特色引入捷克语教学,从而培养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精通一门实用外语,进而增强学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优势。库珀^[15]认为语言规划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语言之外的目的,对语言规划的理解不能脱离其社会环境或者离开产生这个环境的历史。一般来说,影响语言选择的原因主要有历史的、地理的和经济的三个方面,其中经济因素尤为重要。因此,高职院校外语教育规划者应根据区域经济和学校特色发展需求,制定差异化的外语教育规划,使之能够与地方经济和个人发展相匹配。

(三) 以学科素养为核心重塑高职外语课程导向

库珀认为,语言规划指的是为影响人们在语言习得、语言结构或者语言功能分配三个方面的行为而有意付出的努力。为语言习得行为所付出

的努力即习得规划,《课程标准(2021年版)》对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学科核心素养进行了详细阐述,这在以前的两次政策文件中是没有的。四大核心素养包括:职场涉外沟通、多元文化交流、语言思维提升和自主学习完善。文秋芳、张虹对四大核心素养的内涵和发展目标进行了具体讨论,认为每个核心素养都包含关键能力、必备品格和正确价值观三个发展目标,其中关键能力是显性目标,必备品格和正确价值观则是内隐在关键能力培养中的^[6]。文秋芳教授作为《课程标准(2021年版)》研制组组长,其解读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从解读可以看出,高职专科外语教学不只是为了学生更好地学习外语、满足职场沟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文化对比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从而传播中国文化,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表达中国人的观点,增强中国文化自信。因此,在外语教学中要加强对语言隐性文化功能的挖掘,在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过程中不断增强“语言资源”意识^[7]。

(四)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提升高职学生外语自主学习能力

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条件,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制定高职外语教育政策时一向重视现代化教育技术的应用。《普通高等专科学校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提出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认为应积极引进和使用计算机多媒体、网络技术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改善学校的英语教学条件,而最新出台的《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年版)》则花费了更

大的篇幅阐述信息技术的重要作用:提升信息素养,探索信息化背景下教与学方式的转变;教师要树立正确的信息化教学理念,注重现代信息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努力实现英语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提高英语教学的实效;教师要充分利用媒体、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仿真等技术,依托慕课、微课、云教学平台等网络教学手段,利用翻转课堂、混合教学模式等构建真实、开放、交互、合作的教學环境。不难看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迭代推动了高职外语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为高职外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在新的历史时期,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应将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教育相结合,开发面向不同职业岗位需求的职业外语课程体系,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此外,教师应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运用数字化技术提高教学评价的科学化和管理的精准化。

五、结语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技能、国际化人才的重要使命。教育部出台高职外语教育政策的目的在于指导外语教学改革、提高高职外语人才的培养质量。而国家外语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贯彻落实《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年版)》的有关精神,使课程标准真正为高职外语人才培养服务,成为各级政策规划者亟需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陈保荣)

参考文献:

- [1]李宇明.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J].外语界,2018(5):2-10.
- [2][10]Kaplan, R. B. and Baldauf, R. B.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 [3]戴曼纯.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学科性质[J].语言政策与规划,2014,1(01):5-15+72.
- [4][15]Cooper RL.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5]Spolsky B & Shohamy E. The Language of Israel: Policy, Ideology and Practice[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9.
- [6]安晓灿.深入学习《基本要求》努力开展专科英语教学研究与实践[J].技术教育学报,1996,(02):15-19.
- [7]杨金土.20世纪我国高职发展历程回顾[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09):5-17.
- [8]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 [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年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下转第62页)

2013(02):3-11.

- [11]刘超,冯春林.共生视域下养老地产投资—开发—运营战略联盟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5):35-38.
- [12]张利珍.十八大以来党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6.
- [13]王欣,刘蔚,李款款.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J].情报科学,2016(07):36-40.
- [14]汤玉梅,杨熙.共同富裕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与优化路径[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22(04):80-90.
- [15]李敏.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企业协同创新共生模式研究[D].兰州:兰州理工大学,2014.
- [16]王海军,祝爱民.产学研协同创新理论模式:研究动态与展望[J].技术经济,2019(02):62-71.

Research on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Science, Education and Industry" Symbiotic Network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Zhang Zuoling

(Shandong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Weifang 261011,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novatively proposes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pointing out a new direction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such as municipal industry-education alliances and industrial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y, the pattern of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has emerged,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guide practice. Based on th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ymbiosis theory, the paper constructs a community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industry" in the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xplores the driving mechanism and organizational model of the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industr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ymbiotic activities such as talents train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optimize the position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ypes.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symbiotic network

(上接第 43 页)

- [11]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12]张蔚磊.微观语言规划理论在我国外语课程政策实施中的探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39(6):94-101.
- [13]张蔚磊,王辉.微观语言规划理论及其对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启示[J].外语研究,2022,39(01):74-78.
- [14]Gorman, Thomas P. Language Allocation and Language Planning in a Developing Nation. In Joan Rubin and Roger Shuy, (Eds.), Language Planning: current issues and research.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16]文秋芳,张虹.《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年版)》核心素养的确立依据及其内涵解读[J].外语界,2021(5):2-9.
- [17]李铁.“一带一路”沿线不丹国家语言政策——以斯波斯基社会语言学为理论视角[J].2020,41(6):49-53.

Research on Policy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hen Lingmin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education planning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language education. This paper briefly explains the concepts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and Cooper's "Accounting Scheme", and uses the theory of "Accounting Scheme" to analyze the policy evolu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Finally, we propose to tak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Junior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2021 Edition) as an opportunity to scientifically pla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evolution; educational planning